

1958年春天,反“右派”斗争结束之后,在各级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股高压,脱离实际提出了“高指标”,搞“瞎指挥”,下级害怕扣“反党”帽子不敢说出不同意见,谁不讲假话谁就垮台。于是刮起了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

瞎指挥与“浮夸风”

1958年春天,阳春县掀起积土杂肥创水稻高产的运动。为了运输土杂肥到田提高工效,3月1日,中共阳春县委发出“关于苦战百天,消灭肩挑的决定”,要求全县组织一次消灭肩挑实现车船化的大会战。基层干部就提出了“大刀当斧头,砧板当车轮”的口号。4月1日,阳春县城举行4000多人的“大跃进誓师大会”,会后举行大游行,要求每人推一部手推车参加游行。有的干部拿不出什么木料,也不会制什么手推车,便用竹竿搭个车架用竹筛糊上旧报纸当车轮也推到县城街上参加游行。从领导到工人都看到了这种玩具式的“车子”,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捅破这层牛皮纸。《阳春报》、《阳春通讯》都发表了“车子化”的专版报导。

1958年5月,由于阳春报社有两位记者被划成右派送到黎湖农场劳动改造,我从县委办公室工作组调到阳春报当记者,从此后4年间采访过阳春县、两阳县重要大事,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5月19日,县委在圭岗召开第一届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147人,列席1808人。大会贯彻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开展“大跃进”运动。由于湖北省委推广麻城县小麦亩产超万斤丰产田的经验,阳春县委提出了“学麻城,赶麻城”的口号,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到田头搭木皮棚屋架设电话办公,实行“四到田”创高产。

6月中旬的一天,县委农村工作负责人打电话召我到第一区区委田头指挥部(在春城东门垌),说他已经准备好了一版推广积肥运动的报道,附城各乡、社到处出现了“肥龙、肥山、肥海”,其中高朗农业社每亩积肥19700担。所谓“肥龙”,是到河边、公路边铲草皮坭堆成“长龙”,标题是《人民桥畔出肥龙》;所谓“肥山”,是到山

『浮夸风』导致大饥荒纪实

——一个县报记者的手记

钟万全

上铲草皮坭堆成许多圆堆,标题是《扶民岭上不夜天》(挑灯夜战积肥);所谓“肥海”是斩下树枝树叶放到山塘水库涵肥水成了“肥库”。负责人说高朗社的小山塘做“肥库”规模不够大,现在缺少《黎湖水库成肥海》一篇文章,分工由你写。我说要到现场采访才能写。负责人说我叫一个人口述你记录就成,等不及采访了。而我一定要到黎湖水库看一看,蹬起单车半个小时就到水库堤坝上,一看就吓得心里发抖,只见茫茫水库的堤坝边清澈的水面浮着20来束青枝绿叶,这就是“肥海”吗?这样的文章我的良心不能容忍我写。我只把负责改好的高朗社积肥等几篇报道带回交给副社长排版,大家噤若寒蝉不议论。6月21日,《阳春报》刊登了通讯员来稿《合水乡平中农业社每亩有肥77000担》的“新闻”,说是采绿叶丢到平中河陂头上,变成“肥河”。省报也在头版右上角发表了报道,标题是《阳春每亩积肥40000担,阳江每亩积肥20000担紧紧赶上》。有这么多肥,粮食还不高产吗?

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位著名科学家的文章,他从理论上说明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亩产就有可能达到40000斤。《长江日报》推广了湖北省麻城县试验田小麦亩产超万斤的报道。中共广东省委主要领导著文《驳粮食高产有限论》,说广东粮食是可以达到亩产10000斤的。在舆论和上级的压力下,中共阳春县委于6月中旬组织全县干部参观高朗社的“肥山、肥龙、肥海”,推动全县积土杂肥。6月22日,中共阳春县委、阳春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全党全民开展种试验田搞高产片运动的决定》,号召所有国家干部、学校教师和农业社员一律参加种试验田,学麻城、赶麻城,力争试验田粮食亩产超万斤。7月8日,县委领导机关干部在县城南门垌插植“水稻亩产万斤试验田”。这块田确实实施了超量的肥料,到县食品公司运来猪屎粪每亩200余担,到鱼塘挖来塘坭每亩300余担,由农业技术员计算每亩田生产10000斤稻谷需要的含氮、磷、钾数量,施用大量的磷粉、牛骨粉、尿素等作底肥。秧苗插植规模是1平方米方格留6寸通风沟,方格内采取单枝插植秧苗1市寸×1市寸以下的“满天星斗”、“蚂蚁出洞”形式。我们县委机关大院干部每人

专题史料

负责插植1平方米面积。《阳春报》登载了专题报导。住在田头指挥部的县领导提出“要以寡母熬儿之心管好试验田”。禾苗长到一尺高时，青枝绿叶密不透风。发现禾根有发热变黑迹象，大家日夜引渠水对流灌溉，调来了手摇木风柜和电动鼓风机往秧田通风。试验田终于因植枝过密施肥过多，禾苗没能抽穗扬花就枯黄腐烂了。县领导如实向上级汇报亩产万斤试验田失败的情况。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报导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北省徐水县的通讯，徐水县委书记告诉毛主席：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各地马上闻风而动响应。8月8日，中共阳春县委作出“关于四级干部田头大会师，苦战4个月，实现粮食亩产双千斤，番薯亩产双万斤(市斤)”的决定，并在春城西龙岩社搭了田头寮食住在田头，管理番薯亩产超双万斤的试验场。阳春县委这个决定无法实现。但是到了秋收时节，各省报纸先后刊登粮食亩产万斤“高产卫星”的报导。广东某报发表广东连县星子公社亩产稻谷70000斤的新闻，还配了一张大姑娘坐在稻穗上的照片。后来，出外参观学习的干部发现“亩产超万斤”的秘诀是“拔禾并田”，把几十亩已经黄熟的稻、麦棵连根拔起并于1亩田内摆好照像。但是阳春、阳江的县报都没敢刊登这种并田谎报“亩产万斤”的假新闻。我是个老实的书呆子，秋收时以《阳春日报》记者身份跑到“社会主义示范乡”圭岗乡，到割麻窝生产队选了一块插植溪南矮品种的水稻丰产田，和农民一起收割脱粒，当场扬净过秤湿谷八五折算为干谷，平均亩产量为831斤，写成新闻登报。

1958年11月4日，阳江、阳春合并为两阳县。秋收后全国开展了“反瞒产运动”，认为各地高产报低产，粮食有的是。11月8日，两阳县召开全县电话会议，提出“坚决开展群众性的反粮食瞒产、反贪污、反浪费‘三反’运动”。11月18日，两阳县召开并县后第一次扩大干部会议，总结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公布两阳县一年来取得粮食增产2.3倍，全县粮食总产达到290700多万斤，从11月1日起全县（各公共食堂）实行“一日三餐饭，食饭不要钱，在粮食上各取所需”。要求1959年为“实现亩产万斤县而奋斗”，粮食平均亩产11177斤，平均每人占有粮食8630斤；养猪300万头，每年每人吃到猪肉100斤、鲜鱼250斤、花生油49斤、蔬菜720斤。要求办好公共食堂，巩固人民公社。

“反瞒产”、报高产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报越假。到1959年1月21日，两阳县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公社干部、生产队长、会计员、保管员等10143人的干部扩大会议，进行“反瞒产”，会议历时18天。由于塘坪公

社报出“全社平均亩产双千斤”，县委组织干部到塘坪公社各生产队参观，各队的谷仓都装满了谷，一些心存疑惑的干部偷偷带了粮管所粮仓抽样验谷质量的空心小铁条，爬上谷堆之上猛插下去，发觉两尺之下发出“篷篷”之声，便私下议论下面堆放着柴草、谷围、风柜，或者是谷壳。参观的干部识破了塘坪公社的假高产、假谷仓，但大家心照不宣，在会议上缄口不语。因为此时的县委和塘坪公社的负责人是北方干部，谁人敢于捅穿假高产之谜，有可能马上就要戴上“地方主义分子”或“反党分子”帽子。县委四级干部会议要求学习塘坪公社“报实”产量，“不报出瞒产不得回家过春节”。会议又开了10多天，并到春节除夕之夜。因压力大，有一位生产队队长在阳江第一中学会议住地的荔枝树上吊自杀。县委闻报大惊，怕年初一有骚乱，连夜下令结束“反瞒产”的会议，让全体干部星夜步行返家，阳春边远公社、大队的干部步行至年初一夜间才回到家中。

继续跃进和实割验收

1959年春天，两阳县委通过“反瞒产”逼出了一个粮食假总产量，认为去年生产了“可以吃3年”的粮食，提出了“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要求全县以1958年种植水稻143万亩减少为60万亩，要求山坑边远小村庄抛弃山坑低产田迁出平原并入大村参加公共食堂，把山村旧屋的泥砖拆下作肥料。按1958年总产量7.4亿公斤为基数，1959年计划生产粮食5.2亿公斤，预计每人平均有口粮350公斤。根据山东省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大山农业社深翻改土增产10%的“经验”，两阳县委提出1959年的主要增产措施是深翻改土挖地三尺，小枝密植，力争粮食增产继续跃进。

春耕时节，中共广东省委另一位主要领导人轻车简从到达两阳县，他只带了一个司机、一个秘书，县委派了政府办公室主任陪同，《两阳日报》社派了我这个分工上层采访的记者跟随，希望得到些“吃透上头”精神的讯息报道。我们坐小车往沿海的平岗公社、海陵公社进发，路过平岗公社平洋垌高产试验片，这位领导听到田垌中间发起竞赛的呐喊声，就停车下到公路边观看。这时，平岗公社党委在平洋垌搞深翻试验垌，集中劳动力把全垌水田深翻1米，那深翻坑就象抗日战争时公路上、山坡上挖的梅花坑和战壕防御工事，田垌的黄土、沾土、砂砾都挖上来了。那些青年突击队员正在平整水田准备插秧，用大水牛拉着耙耙过去，大水牛陷进深翻坑爬不起来，在那里挣扎。突击队员用力拉牛，吼叫“冲呵！冲呵！”这位领导右手食指绕着条小链子打转转，苍白着脸一言不

发,默默上车示意开车往海陵岛进发。海陵公社负责人汇报,说他们海陵岛的田底下是盐碱砂质土,不宜深翻,主要增产措施是把小咸鱼捣碎作底肥和把海蜇皮沤人粪尿施肥。我跟随这位领导跑了3天,他只看不表态,我没有记录到他一句“指示”。随行李、公社干部送他上小轮船离开了闸坡港。我心里揣度这个“深翻改土”、“少种高产多收”的做法不合他的心意,但也不便出言泼冷水。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都不肯执行两阳县委提出水稻插秧面积减到60万亩的“少种、高产、多收”计划,仅原阳春县境1959年度早晚两造播种面积就达到133万多亩(种植面积66.5万亩),比1958年度两造播种面积160万亩少种27万亩,全年粮食减产472918市担,减产15.5%。如果两阳县仅种植水稻60万亩,两造播种面积为120万亩,减产后果更不堪设想。

1959年9月,中共湛江地委调李军担任中共两阳县委书记兼县长,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秋收中组织一次实割验收产量。他带领县、公社、大队干部200多人,坐公共汽车到平岗公社的埠场大队等地,选择高、中、低产田实割过秤,丈量实割面积,计算平均每亩水稻产量,进行验收。《两阳日报》派我作随行记者,参与了丈量实割面积和计算湿谷折干谷平均亩产的工作。埠场大队中等田每亩平均产量630斤,良朝大队丰产田每亩平均产量820斤,五旦大队海边咸酸沙田每亩平均产量450斤;海陵公社食塘大队的公社干部丰产田每亩平均产量930斤,红光大队丰产田每亩平均产量650斤,蔚元大队丰产田每亩平均产量915斤;岗列公社岗列大队丰产田中等田每亩平均产量650斤,盐灶垌低产田每亩平均产量420斤。我每天都写报道寄回《两阳日报》发表,还称为“三堂会审”验收。海陵、平岗、岗列三个公社都是沿海先进公社,实割验收产量与山区丘陵的塘坪公社谎报全年平均亩产双千斤相去甚远。客观事实驳斥了“浮夸风”和“反瞒产”的错误。平岗公社丰产试验垌平洋垌因深翻三尺打乱了耕作层,水稻严重减产,更证明“瞎指挥”的失败。

1960年1月,两阳县委贯彻上级精神,“反右倾”,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人人上挂下联向党交心。我参加学习班,天天讨论交心,大会典型交心。我交了不相信亩产万斤和怀疑塘坪公社有平均亩产双千斤的“真心”,也交代了写1959年秋收实割验收产量报导的“右倾思想”,又交代了有同情马寅初人口论,赞成计划生育的“黑心”,领导仍然说我“有严重问题还未交代”。我惶惶不可终日。1960年2月间,县委书记向我交了底,说是有人向《南方日报》社寄了两篇文章,恶毒攻击谎报粮食高

产和饿死了人,想查出这个人,经过核对亲属笔迹证明不是你写的,但你接触写稿的人多,笔迹也见得,要你来看原稿认出写稿的人。我接过秘书交来报社退到县委的厚厚一叠原稿,表示不认识是何人笔迹。后来听说查出是新分配到农业局不久的一位大学生写的,就把那位讲老实话的同志抓去劳动教养,后不知下落。正在反右倾的节骨眼上,2月3日,中央政治局委员、总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彭真等70余人的中央检查团从湛江到达两阳县。县委提前一天把正“交心”的100多名“右倾分子”用汽车运到“社会主义示范乡”圭岗“参观学习”,防止有人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浮夸风”报高产和饥饿水肿病的实况。3月间县委把县城机关干部中内定为“右倾分子”或有“右倾思想”的干部分批下放到生产队或农场、海陵大堤工地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原阳春日报社合并到两阳日报社共有编辑、记者8人,先后下放劳动的有6人。汤金源分工采写塘坪公社全年平均亩产双千斤的报导。文章见报后,他向人吐露了怀疑的思想,被认为是“口是心非”,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0年冬,我被分配到松柏公社新光大队清水塘生产队劳动。6月,县委书记兼县长李军,也因“地方主义错误”被免去两阳县县长职务。由于“左”倾错误的继续,导致了3年大饥荒的进一步发展。

“共产风”和公共食堂

1957年12月底,阳春县全面完成合作化,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与分配还未得到一年两造时间的巩固,县、区、乡三级干部为抢救减产减收的三类型社,为解决年终分配出现的现金超支户和盈余户矛盾问题,工作非常吃力。1958年8月中旬,中共阳春县委派出一名副县长带领一批干部到河南省遂平县参观建立嵒山人民公社的经验。8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贯彻到县,只经过10天的宣传筹备,9月3日,岗尾人民公社成立;10月1日前,以区为单位14个人民公社全部建成,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全面泛滥开来。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阳春14个人民公社成立一个月后两阳并县,又并为漠阳、春北、南南、春西、西山等5个大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政社合一,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公社为团,管理区为营,下设连、排。县钢铁师司令部统一调动劳动力大搞钢铁大会战,剩下的劳动力多是老、弱、妇、孺,致秋收不及时,稻谷脱粒,花生没人翻锄收获。取消评工记分和按

专题史料

劳分配,原高级社社员分配的超支盈余账一风吹。生活集体化,实行伙食供给制,原阳春县境以连、排为单位建立起了588个公共食堂;社员家庭的铁锅、铁云鼎以及各种铁器全部上缴炼钢;收回社员自留地,原自留地的蔬菜由食堂无偿采食;公共食堂组织蔬菜队种菜,组织畜牧队养猪、鸡、鹅、鸭;全体劳动力分级别每月发津贴,公社“一平二调”商品和砍伐木材放“经济收入”卫星,取消小商贩和农贸市场。平岗人民公社(圭岗、永宁)放经济卫星之后发津贴只维持了3、4个月,每人按级别发放2至5元。当时还试行取消干部、工人的工资制,两阳并县后只有平岗公社试行3个月,就接中央指示停办,平岗公社给干部、工人补发了3个月工资。

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由河北省徐水县和山东省范县首先提出了对社员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嫁”“十包”,全部费用由公社供给。由于被“浮夸风”报高产冲昏了头脑,两阳县在1958年11月2日同时召开电话广播大会,“祝贺全县农业大丰收”,“祝贺全县人民进入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开端”,宣布全县人民“日食三餐饭,吃饭不要钱”。社会主义示范乡圭岗公社宣布公共食堂做到“九菜一汤”。我赶忙到圭岗采访,到圩头公共食堂和农民一起吃一顿每桌“九菜一汤”的晚饭。在食堂里,几个大竹箩装满热气腾腾的大米饭,菜是以社员自留地里和山场里收归公共食堂的白菜、芥菜、苦麦菜、南瓜、生姜、木薯、大薯、甜薯、狗仔豆等。我又到圭岗公社高垌营参观3000人一起吃饭的大食堂盛况,同样是吃“九菜一汤”。食堂门口对联大书:“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饱暖万人心”。一日三餐饭吃了3个月,先是改为二饭一粥,再改为一饭二粥。各地公共食堂反映粮食无法供给到夏收,两阳县委认为下面“瞒产私分”粮食到户,召开了20000干部大会“反瞒产”。1959年3月,中共湛江地委主要领导独自一人不带秘书,坐公共汽车到阳春合水镇之后,步行50多华里山路进圭岗公社,要亲自察看人民公社社员的生产生活。恰好我又到圭岗采访,就陪他到鱼花塘生产队公共食堂吃一顿午餐。我到食堂厨房窗口领到每人一大碗清粥和一小碟狗仔豆干片。地委领导没有发表什么谈话,我又和他作伴步行出山回县。《两阳日报》发表了地委领导到公共食堂就餐的报道。到4月份,粮食危机到来,山场的狗仔豆、木薯吃光,种菜组的蔬菜供应不上,山穷水尽。被迫上报“平均亩产双千斤”的圭岗公社向县里诉苦讨救济粮过活,县里不相信,接着社员就发生了浮肿病。

1959年2、3月间,中共中央在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各地普遍整顿人民公社,纠正“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左倾错误”之后,接着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毛泽东主席提出十四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即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付盈亏;计划分配,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中共两阳县委在1959年5月贯彻了中共中央郑州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和上海会议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调整了过大的公社规模和军事化的组织。两阳全县由19个公社分为27个公社,实行体制下放,原来的营改称管理区之后,原高级农业社改称生产大队,全县共建立158个生产大队和2949个生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32.9户146人。根据中央的指示,继续坚持办公共食堂,作为走向“共产主义的阵地”。这时,不办大食堂了,以生产队为单位办公共食堂,实行粮食指标分配到户,由各户挂牌报每餐开饭开粥的米数,节余归己。

1959年4月以后发生的大饥荒,在两阳各地的情况是:山区严重,平原和沿海较轻;干部作风浮夸的地方严重,干部头脑清醒作风踏实的地方较轻。机关干部每人每月粮食供应由30斤减到23斤,居民则减到21斤;花生油脱销了,改为每人每月供应黄豆油或糠油2两。1959年5月以后,我常在阳江沿海的海陵、平岗、岗列公社采访,看到半渔农的大队各公共食堂都派出渔业队捕捞鱼虾海鲜,还有远海渔船清仓的咸鱼水供应,各食堂社员自己掌握粮食指标,每天食两饭一粥或一饭两粥,供给平稳,未看到有人患浮肿病。阳春地区平原的春湾公社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松,对“浮夸风”和“共产风”提出实事求是的意见之后,辞去刚提升的公社副社长职务,回家继续担任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他迅速停止“一日三餐饭”,坚持粮食供给指标到户,计划用粮,坚持种好蔬菜和番薯杂粮,3年困难期间全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受到社员的爱戴。而浮夸最严重的圭岗公社,则出现了3000多浮肿病人,死人情况严重。其中1959年、1960年集中到圭岗卫生院抢救的水肿病和干瘦病人死亡达360人。

1959年至1961年3年困难时期,两阳县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没有作过统计。我在编辑《阳春县志》的时候查阅统计局资料,获知1958年、1959年因“浮夸风”报高产,上级按高产量下达了“高指标、高征购”任务,阳春县境1958年比1957年增加购粮5915吨,1959年又比1958年增加购粮13660吨,社队紧缩留粮超过了农民承受力,加上公共食堂一日三餐饭,1959年又盲目提出“少种高产多收”导致减产15%,使饥饿情况进一步严重。1959年4月至6月,两阳县府给原阳春县境返销粮6705吨,全年退库9960吨,仅及两年增购粮的一半。

3年困难时期婴儿出生率降低，浮肿病人死亡的情况严重，其中最严重的是1959年，总人口净减数达2281人。

整风整社和清理“共产风”

由于1959年粮食实际减产15%和下达高征购指标，1960年春天许多公社、大队的公共食堂粮食供给极其困难，其中阳春地区的合水、潭水、春湾等公社上报的粮食平均亩产最低，公共食堂叫喊缺粮的呼声最高。2月9日，中共两阳县委在圭岗公社召开山区公社现场会议，继续鼓吹圭岗示范公社的假增产，号召全县山区公社广泛深入“学圭岗、赶圭岗、超圭岗”的群众运动。3月4日，县委召开机关干部“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把400多名干部下放到潭水、合水、春湾等公社，到生产队和社员“三同”，办好公共食堂。这时，120名干部下放到潭水公社，我是其中1名，住到盘安大队锅耳屋生产队。锅耳屋大队公共食堂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为大米5市两，两粥一饭，早、午每人清粥大米1两，晚上砵蒸饭大米3两；工作队每天是早、午清粥大米2两，晚上砵蒸饭大米4两。生产队没有种活一棵青菜，食堂天天用生盐拌粥食一大砵清水汤。20多天后，120名下放干部浮肿脚22人，全社群众上报饿肿脚的有3000多人。下放到潭水公社当党委书记的一位副县长向两阳县委告急，承认公社生产搞得不好，产量全年平均仅600多斤（实际仅450斤），甘愿受党的处分，请求县委紧急调运粮食救济，否则就会大量饿死人。4月，两阳县委召开全县公共食堂代表会议，中心内容是“一定要把全县6500多个公共食堂办好”。县委召开10天的四级干部会议，决定在全县开展以“三反”为中心内容的整社运动。会后，县委分别调运大批粮食（稻谷、番薯）救济潭水、合水、春湾等公社，而被吹起的“学习”榜样圭岗公社因没有分到救济粮而陷入绝境，大批水肿病人死亡。潭水公社党委书记接到县委用船调运的稻谷、番薯，安排了每个公共食堂每人每月有粮食原粮24斤。同时，他又紧急办好几件事：一、把饿肿脚的工作队员、下放干部调回公社机关食堂改善生活几天再回生产队；二、各生产大队集中水肿病人吃“营养餐”，杀几头老弱残牛，以全头牛连皮、骨熬黄豆、黑豆营养汤，以玉糠、黄糖、硫酸亚铁丸煮营养大米粥给水肿病人吃；三、责令工作队员，参加生产队抢种一批快速收获的通心菜、甜菜，并种好冬瓜、豆角等各种蔬菜，所有旱地和荒滩、山坡尽可能犁耙开垦，种上番薯，特别是“60日”早熟种番薯。一个月后，潭水公社浮肿病人危局大大好转。

潭水公社书记把我调到旗鼓大队的公社田头指挥部，在横屋生产队公共食堂开餐，分工我写些积极生产渡荒的正面报道。这时，旗鼓大队各生产队种植的大批番薯已经陆续收获，食堂每人每天供应熟番薯2斤，加上三餐两粥一饭，集体菜园收获了成堆的冬瓜，还有各种蔬菜。我走遍10多个生产队，没有看到一个浮肿病人，我执笔写了人物通讯《五好干部刘昌芬》（旗鼓大队党支部），表彰他领导社员搞好生产办好公共食堂的先进事迹，送到《两阳日报》发表了。

6月29日，中共两阳县委再次下放干部572人，分配到公社基层，与社员“四同”（同食、同住、同劳动、同办好公共食堂）。

1960年10月，党中央部署整风整社，中心内容是肃清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重申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彻底退赔；加强生产队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少量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恢复农村集市，等等。两阳县委把两批下放干部700余人集中到春城人民公社，分配到各生产大队每个生产队。当时还强调，只要坚持三级所有，坚持部分供给制，办好公共食堂，就不会犯原则错误。县委领导在原阳春人民医院的西楼设办公室驻点开展春城公社试点工作。

我分配到石菘大队工作组。县委决定“冬至”节这天，在春城公社选择漠垌圩和石菘圩开放自由市场，试行农副产品议价销售。我们工作组和石菘大队干部研究，从大队副业队拿出一批塘鱼、活鸭、瓜菜试销。当时国营商店的牌价是活鸭每斤5角多钱，鲜鱼每斤4角多钱。我们不知道卖议价该收多少钱，布置副业队员把价格提高到买主能够承受的程度为宜。正在石菘大队田野上开机钻探铜矿储量的地质队干部工人听说石菘圩开放“自由市场”，蜂涌而来，围着鸭笼、鱼篮要购买。这时议价鲜鱼、活鸭卖到每市斤1.2元至1.5元，并稳定了一段时间。至1961年议价上升，活鸭每市斤售价4.5元，猪肉每市斤8元，番薯每市斤1.2元。而一般干部每月工资30元左右，只能买到一头鹅或30斤番薯，生活十分困难，有的自称为“一个鹅的干部”，有的公社干部自动辞职回家养鹅、开荒种番薯。

1961年1月，中共两阳县委决定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以原阳春县的圭岗、合水等4个公社为先行点，重点整顿干部的浮夸风、命令风、共产风。中共两阳县委领导负责圭岗公社的整风整社工作。2月，圭岗公社三级

专题史料

干部会议，整顿虚报亩产双千斤的浮夸风，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死者家属哭诉1960年春荒领不到救济粮的凄惨状况。县委领导严厉批评圭岗公社负责人。圭岗公社负责人原是一个埋头苦干的老实人。但他担着“圭岗社会主义示范乡”的名义，顶不住“浮夸风”报高产和“反瞒产”的压力，在公共食堂严重缺粮时无力争到救济粮，造成上千群众浮肿、干瘦死亡。他听了群众的控诉和县委领导的斥责，默默垂泪，2月9日下午关上房门上吊自杀。人们把他和那些在公社卫生院死亡的360名浮肿病人一并埋葬在公路边的山洼里。

贯彻“救命政策”

1961年3月25日，省人民政府通知两阳县分治，恢复阳春、阳江两县建制，正在进行整风整社和清理共产风先行点的工作队撤回原属本县。3月28日，原阳春的干部搬回阳春县委、县政府空洞残破的原址办公。原《两阳日报》停办，县报不办了。我从参加劳动的松柏公社新光大队清水塘生产队回到县委大院，分配到农村部当办社干部，只领到两块床板。一位同志告诉我，两阳县委已经召开过机关干部大会，对“大跃进”、“反右倾”受整的干部甄别平反，当众焚烧材料，其中宣读有你的名字和一袋材料。我马上背起背包到圭岗公社圭岗大队，当一名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政策的驻队干部。这时，原两阳县委在阳春5个公社进行整风整社、清理共产风的工作队撤离，阳春县级机关重建，百废待举。4月19日以后，阳春县境连降两场暴雨，沿漠阳江两岸20个大队16000多人被洪水围困了9日9夜，全县遭受水灾的生产队占52%。重返阳春县任领导的马如杰率领三级干部投入抗洪抗灾。他到职后在干部会议上讲话，提出立即“见缝插针”抢种早熟杂粮作物，丢荒田地、荒坡、水沟、公路边、荒山塘、幼杉林地，都可以开荒种上番薯、玉米、黄豆、水旱物、粟类等，集体种集体收，个人种个人收，国家机关干部集体种集体收，以补充粮食短缺。马如杰说：“救命要紧，如果有人说是资本主义，责任由我马如杰承担，让群众吃饱肚子之后我再检讨。”

阳春县境由于农村连续3年减产，群众生活极为困难。1961年4月间，阳春县委工作队和医疗队到各公社，集中28000多名水肿病人到公社治疗，县增拨专用药品、营养品，给病人吃营养餐，设中药熏烟浴室为浮肿病人蒸汽浴消肿。5月统计，全县治疗康复的有25995人，累计治疗无效死亡2098人。县、公社妇联干部配合医疗队在各公社设立临时妇科病院，收容闭经妇女6389人，子宫下垂妇女4144人，全部基本恢复健

康。到6月，扩种的番薯、杂粮收获后大饥荒险情已经缓解。7月早稻收获，荒情完全解除。

6月，中共阳春县委根据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精神，以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为中心，继续进行整风整社和赔退“共产风”。解决了十个问题：一、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全县分社38个农村公社、1个镇公社、1个水上联社，下面调整为560个生产大队、5380个生产队；二、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对生产队实行“三包四固定”；三、分配实行三七开，三成基本口粮供给制，七成按工分分现金；四、生产队对社员实行定工、定勤、定交家庭肥；五、耕牛、耕具所有权下放到生产队；六、解散公共食堂，按总耕地面积5%分配自留田地到户，允许种植稻谷、杂粮、蔬菜；七、粮食分配到户；八、恢复社员家庭饲养生猪三鸟，私养为主，公私并举，所有小猪见母就留作母猪加速恢复繁殖；九、开放农贸市场，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后允许余粮上市；十、彻底赔退“共产风”，赔退范围包括拆屋、收缴铁器炼钢、包上调经济“卫星”，建造大型水利征用物资（拆青砖瓦屋1间赔500元，坭砖瓦屋赔200至300元），国家、公社、大队哪一级刮风的由那一级的赔偿，共赔退金额1598万元，限6月25日退赔完毕，不留尾巴。

这时，毛泽东的一封信被原原本本地传达到基层。他说不相信亩产10000斤，“有800斤就谢天谢地了”。毛泽东多次在中央会议上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据此，阳春县委新闻调查核实的“大跃进”3年的粮食产量，各年份统计如下：

年份	粮食面积(亩)	平均亩产(公斤)	总产量(吨)	其中稻谷平均亩产(公斤)
1956	1770525	91	161433	122
1957	1677632	89	148800	108
1958	1600275	96	152620	118
1959	1332761	97	128974	111
1960	1453454	90	129759	102
1961	1456386	90	131092	106
1962	1440788	106	152737	125

粮食高产浮夸风至此结束。经过两年休养生息，人民群众体质恢复。1962年秋收粮食总产量超过“大跃进”前的1957年，1963年才超过合作化的1956年。

（作者曾任中共阳春县党史办公室副主任，《中共阳春地方史》主编）